

中國文化與華僑教育

謝佐禹

—爲中華會館五十周年紀念而作—

南洋各地之有中華會館，始於清末南海康有爲氏之渡海南遊。藉康氏之指示鼓舞，各地之中華會館，乃相繼成立。（惟爪哇中華會館成立於康氏南來前）康氏在中國歷史上地位如何，爲功爲罪，吾人可不論，然自南洋華僑言，則康氏之功不可沒。今耶嘉達中華會館成立五十周年，主其事者，擬專刊紀念，徵文於余。余於去秋應會館之聘，來長會館學校，自不可無一言爲會館慶。因念康氏，念自身，念中國文化之前途，覺任重而道遠，非繼續努力，將無以竟前人未竟之功。

居異域而設立中華會館，顧名思義，意在保存中國文化，實絕無疑問。耶嘉達之有此一會館已五十年。此五十年，世界之變化極大，中國之變化亦極大。幾經變化，而會館屹立無恙，此誠華僑之福，或亦中國文化之福。中國文化其有否極泰來之一日歟？中國文化在中國已面臨考驗，前途如何，尙不可知。吾人身爲中國人，自不能坐視中國文化之萎縮。吾人主持此一會館，更不能視中國文化如秦越。中國文化之興衰，與吾人有密切之關係。如中華會館不認識中國文化，或不能爲中國文化盡力，則會館爲虛設。會館之最主要工作爲學校。學校負發揚中國文化之使命，至低限度，有維護中國文化之責任。華僑教育之根本意義在此。

故談華僑教育，必須談中國文化。謀華僑教育之發展，必須以中國文化之發展爲歸宿。此義顯明，原不待論。然今日華僑則多有不知此義者。今日華僑，其不讀中國書，不識中國字，不通中國語者，固勿論，即讀中國書，識中國字，通中國語者，對中國文化亦罕能理解，因而罕具熱誠。不理解中國文化，自無法對中國文化發生興趣，亦無法爲華僑教育盡其發揚或維護中國文化之責任。是中國文化之理解，乃華僑教育之先決條件。本文之作，意在斯也。

所謂中國文化者，果何物歟？此非易答之問題，亦非三言兩語所能解釋之問題。中國文化，範圍廣大，歷史悠久，任何人之理解，均必有所偏或有所遺。作者之理解，自亦不能例外。然作者自信如下之理解，爲一種誠懇之努力，縱有所偏，或可供研究中國文化者之借鑑。因不避放言高論之嫌，而以積年所蘊，略發其凡。

中國文化之能屹立於世，垂五千年而不墜者，決非偶然，而必有其本身之價值。中國文化以仁孝爲本質，以實踐爲精神，以直覺爲方法，其與西洋文化有不同處，至爲顯然。如吾人能認識此中國文化之本質，精神，及方法，吾人即能認識中國文化之價值。能認識中國文化之價值，則對中國文化之發揚與華僑教育之改進，始知其下手處。

中國文化乃以仁孝爲本質之文化。仁也，孝也，皆中國文化上最重要之概念。孔子學說，以仁爲主，視仁之實現爲人類至高無上之目標，因有「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之語。所謂「仁」，朱子解釋爲「心之德，愛之理」。程明道仁篇則謂：「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又謂：「豈禮智信，皆仁也」。仁乃萬物本體，人與萬物，均享有之。識得此仁，便能與物不二。惟仁雖與物共，然仁究非物。仁乃萬物生生之理，乃人心之一點靈明。此與孟子所謂「良知良能」或「四端」，實同義而異名。孔孟均志在求仁。孔孟以降，歷代儒者，亦莫不以仁爲本。謂仁爲中國文化之基礎，當無人能否認者。但吾人才能據此即謂中國之所謂「仁」，與西洋基督教之「博愛」相同，仁與博愛，究有毫釐之差。韓愈「博愛之謂仁」一語，王船山「讀通鑑論已加以駁斥蓋儒家之仁，須以孝爲本，或須始於親親。論語。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一語，可爲明證。若讀孝經，則孝之重要性，更爲顯著。讀「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等語，孝之一義幾壓倒仁。所以然者，因儒家認爲宇宙本體固爲仁，然仁之表現於人者則爲孝。求仁必求之於人人所共有者。今人人共有，不學而知，不慮而能者，乃父母之愛子女，及子女之敬愛父母而已。此爲仁在人類間最純潔之流露，亦可謂爲仁之萌芽。培養此種萌芽，使之發榮滋長而不萎縮，即爲孝。孝之作用在培養人類共有之仁，因人類之所已有者，令保持勿失，且加以擴充，俾能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則仁之完全實現可期，仁之必以孝爲本，理由在此。若徒言仁而不言孝，則仁

可變為博愛。博愛則可視父母如路人，視父母如路人，則人類固有之仁，已先消失，安能再愛路人？以博則其愛弛，路人多，不能一一愛，勢必一無所愛。此博愛之失，唯以孝為本之仁能糾正之。以孝為本，則愛不博而實博。人人均由愛一己之父母，進而愛他人之父母，或愛一己之子女進而愛他人之子女，則天下父母子女皆得其愛。此非博而何？故中國文化一方面言仁，一方面即言孝，且以孝為仁之實踐，因而仁不空泛。此其義近人多不知。然中國文化之偉大，僅此足以自豪。

中國文化以仁孝為本質，而其精神則為反躬實踐之精神，或亦可謂為實用與力行之精神。憶明儒許敬菴有言：「學不貴談說，而貴躬行。不尚知解，而尚體驗。」此二語最足以表明中國傳統文化之精神。以哲學論，哲學為文化主流，而中國哲人之全部精神，實會集於躬行與體驗上，談說與知解，乃其餘事。談說與知解，可有而不必有。躬行與實踐，則必有而不能或缺，缺則不成其為學者，不成其為哲人或聖人。中國哲人心目中之哲學，決不在思想系上，不在語言文字上，而在身體力行上。以思想系統或文字語言為哲學，乃西方哲人之見解。中國哲人則重身心之躬行與實踐，無躬與體驗之實者，則其所有言說，中國哲人必斥為空言廢話，為無益身心。學須有益於身心，須身心之能躬行與體驗。此中國哲人一貫之傳統精神，自孔孟以降，莫之或異者。孔子主無言之教，謂：「天不言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孟子亦謂：「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沿及朱子，此意更顯明。朱子云：「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你自去讀，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箇引路底人，做得箇證明的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又云：「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其輕言說而重實踐之精神，無過乎是。哲學如此，其他學問亦莫不然。其他學問，亦不重言說，不重理論，而重實用與人生日用有關之事件。一切學問，如不合乎人生日用，如對人生日用無益，我國儒者即視為無用之學，視為玩物喪志。故格物之說，雖大學早有明文，然我國儒者並不為格物而格物，而僅為實用，為解決人事問題而格物。格物目的全在實際應用。實際應用如滿足，即不再言格物。因而天文，地理，數學，醫藥，農田，水利之學，我國古代學人非無所知，然其知僅止於實用，不作進一步之追求，亦不作純理論之探討。此種由重實踐轉而重實用之精神，有利亦有弊，然研究中國文化者，即不能不重視此一特徵。

中國文化以實踐及實用為精神，而其方法則為直覺或藝術。中國藝術，造詣特深，而境界亦高。研究中國文化者，多以中國之藝術為例，思由中國藝術而表明中國文化。且有謂中國文化乃藝術式者。此在某意義上，亦頗適當。蓋所謂藝術式之文化與思辨式或理論式之文化不同。思辨式之文化，重分析，重思維，而藝術式之文化，則重直覺，重體驗。前者常有嚴格而完密之邏輯方法，後者則常不自覺有方法。希臘文化屬於前者，而中國文化屬於後者。中國文化以藝術為典型。以藝術為典型者，多不重方法，如有方法，即為直覺。所謂直覺，法哲柏格森認為乃一種理智的同情，深入事物內部，而與事物為一之活動。每一藝術家必須有此一活動，必須運用直覺，乃能見人之所不能見，或言人之所不能言。如詩人，如畫家，其所見所言，往往超越常知者，直覺敏銳而已。故中國哲人多以直覺為其主要方法。彼等特直覺以體驗真理，及把握真理。彼等之獲得真理，非由知解，非由思辨，而常藉本身之一種靈光以瞥見之。彼等之哲學，皆由彼等直接有所見而得。彼等常能以肯定之語句，直說其所見之真理，然往往不能證明其真理，亦即不能以系統完整之理論表達其真理。彼等之所有，多為費人思索之片義單辭。此等片義單辭，在言者或能知其所以然，在聽者即不易知其所以然。如孔子：「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如易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等語，均可謂為一種真理，然無詳細論證也，亦即未說明其所以然也。無他，直覺所得而已。故宋儒程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體貼云者，直覺之謂耳。哲學如是，其他學問亦然。如醫學，中國醫生不講方法，然高明者，常能一望而知病人之情況。彼等對病狀之解釋，縱不合理，對症下藥，則往往有驗。此直覺之效也。他如射藝書數之學，亦多恃直覺。恃直覺，則父不能以傳子，子不能以傳孫。離婁之明，公輸之巧，身沒而學亦失傳。因而各種學問在某一時代可有極

高之成就，在另一時代可寂無所聞。此以直覺為方法之文化，利之所在，弊亦伏焉。

中國文化之本質，精神，及方法，略如上述，雖嫌簡陋，可見一斑。此種文化，有優點，亦有缺點。如以孝為本之仁，流弊在知有家庭而不知有社會。重實踐者輕理論，重直覺者輕邏輯。中國今日所演之悲劇，決不能謂與傳統文化無關。傳統文化之有毛病，作者絕不否認。然作者所必否認者，乃謂中國文化，絕無價值，必全部推翻之說而已。如此說行，華僑教育，絕無意義。吾人何必再以不良之文交流毒吾人之子弟？華僑教育之尚有意義，即在中國文化之尚有價值。謀華僑教育之改進，在認識中國文化之價值，從而設法保存其優點，及糾正其缺點。吾人之使命，如是而已。



*** 司 公 德 永 ***
JOEN TEK & Co.

Asemka No. 14 Tel. 14

Djakarta



商 入 輸

中華學校與印尼語文

邵錦標

印尼華校，自創辦迄今，已足有五十年了。在這五十年當中，教育的方針，教學的方法，及所用的教材等等，都有變更及改革。最初，大概是以中國私塾作榜樣，教授兒童（所異者不過是國語代替了方言），而後才漸次採用新方法和新教材。然在華校，所謂新方法新教材，也不過是追隨祖國的教育法而已。許多年來，教育界人士，本着愛國的熱忱，及發揚祖國文化的精神，固然是值得敬佩。可是忽視了事實和環境，來辦教育也不是辦法。難怪華校雖有了半世紀的歷史，而成績則除了無形的愛國心外，其他實際的成果，簡直是微乎其微。不但如此，身居殖民地的華人，雖然一大半是生於斯，長於斯，而死於斯，但對於原住民的語言文字，常有侮蔑的表示或行動。其中原因，是否為了一種優越感，未敢斷言；但很少要認真學習印尼語文者，却是事實。華僑中，當然有學習外文的，但不是荷文，就是英文。這種畸形的狀態，也許是殖民政策的產物。因為老實說，在當時的印尼是荷文最吃香，不必學習印尼語文，也已經可以處處通曉了。

世局不斷地變化。殖民地的印尼，現在已光榮地翻身而變為國際公認的獨立國家。如今，印尼不但擬定了國籍法，並且頒佈了規定印尼語文為國文的法令。此令一下，則所有公文均須以印尼文繕寫的為合法。這樣以來，印尼語文，不特在國際上佔了一席之地，而對於華僑也更有莫大的重要性。以前不懂一字一句印尼語文，仍能不感任何不便的人們，而今則難免要遭遇到種種的阻礙和困難。不特如此，印尼既然獨立，就有權規定印尼語文為各校應有的必須科，並施行強迫教育。在印尼方面是如此，而在華僑本身方面，不懂印尼語文，也將會感到身入異邦的不便。

華僑與印尼民族之關係，原已密切，並有悠長的歷史。現在印尼獨立了，華僑既身同籍民，對於印尼之興衰，也必須竭其所能，加以支持。不論在政治上，經濟上，以及文化上，華僑與印尼民族亟需合作。但是，合作談何容易，要合作，則必須先相互了解，要相互了解，則必須先講通思想。中國有中國的歷史，而印尼也有印尼的歷史，要講通兩種各有各的歷史背景的民族，則不得不借重於語言文字。如果華僑能以流利的印尼文，介紹中國文化及思想給印尼民族，同時，也能將印尼的文化及思想用中國文介紹給華人，那麼合作的成果，必定會有意外的良好。關於印尼的記載，在目前雖然仍以荷文英文為最多，最詳細，可是這些記載，為了種族偏見，及優越感的關係，難免含有征服者敘述被征服者的論調。有了這種種因素，這些記載實不能視為忠實的記載。理想的史料記載，當然有待於印尼人自己去研究，去編著。這一層也增加了印尼語文的重要性。

如今，雖然有很多華僑自以為素諳印尼語文，但是要知道，印尼獨立後的印尼語文，是為不拖泥帶水的標準印尼語文，而並非華僑所熟悉的一種。這所標準印尼語文，照一般研究過的人們的估計，學習起來，起碼也要三年，方能得其真諦。華校如能依照印尼教育部所規定加授印尼語文的節數即：小學三年級起每週六節，初中四節，及高中四節，做去，時間也可謂充分了。至於教本，也以採用印尼專家所編著的為宜。

印尼地大人眾，面積有一九〇四三四五點七平方公里羅米突，人口有：原住民約七千萬，華僑約二百萬。物競天擇，為自然定律。因此人生永不離競爭的，在地大人稠的地方（如澳洲）人是與自然競爭的，誰勤勞，就有可能征服自然荒地而享受豐富的生活。但在人口稠密的所在（爪哇為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之一）所有競爭，便是人與人的競爭。在此地，要看誰技能好，學識好，那才會比別人更享受。明乎此，教育的目標，則不應只限於識本國字，懂本國文化而已。教育決不能與環境需要隔離而健在。教育的目標，並不祇要人人識字，而該是要人人能運用知識去應付生活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所有前進國家都在高唱學校應與社會打成一片的由來，也就是洞悉這需要的後果，印尼語文，為印尼社會最感需要者，那麼華僑能否不必學習印尼語文，而會順利地運用知識呢？在印尼，印尼語文無疑地是運用知識的最利工具，所以印尼語文是不可不學習的。

茲為說明印尼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〇年六年間教育的進展起見特將「一九四一年印尼統計冊」所載關於印尼教育統計臚列如次：

種類	1933-1934	1939-1940	增加	百分率
學校	一七,四五〇所	一八,七八七所	一三三七所	七,六六
印尼教師	四一,一一八名	四六,六九五名	五五七七名	一三,五六
印尼學生	一,九〇二九三五名	二,三一〇,五三三名	四〇七,五九八名	二一,四二
持有教員證書的印尼人	三七八,一一三名	五一〇,〇九五名	一三一,九八二名	三四,九一

上述比例，是以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度為基年，又學校一項（只限於領受津貼金者而言）在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度中的一八,七八七所內，印尼學校有一七,六二二所，佔了全數的百分之九四,三。

前面的統計數字和比例，很明顯地指出，印尼的教育，就在殖民政策的壓迫下，也有了長足的進步。獨立自主的印尼，無疑地將積極致力於教育的普及和發展。雖然根據一九三〇年的統計，印尼人識字者，僅有全人口之百分之六、四（華僑也只有全華僑人口之百分之二八,九）但是印尼政府，已有於五年內掃除文盲的決心。華僑也該有所警惕，而應加緊識字運動的工作。

至於華僑在印尼社會國家工作中，所佔的地位及其重要性如何，可於下列的統計數中，（一九三〇年）見其一斑：

參與印尼各業之印華人數統計（單位千人）

	種植及原料製造業	工業	運輸業	商業	自由職業	公務業	其他業務
印尼人	14193,2	2105,1	290,7	1090,9	150,2	491,9	1957,6
華人	144,9	94	12,8	172,	7,2	3	36,1

由上面的數字，可見除了在種植及原料製造業公務業及其他業務中，華僑在比例上（以印尼人七千萬華人二百萬作比例）較少外，華僑參與工業運輸業自由職業及商業的人數均在比例上佔了絕對的優勢，尤其在商業上，華僑超出之數竟在五倍以上。這區區的比較，顯示了華僑在印尼社會國家經濟上的莫大貢獻及其重要地位，實為其他外籍民族所不及。此後華僑勢將繼續盡其棉薄，為印尼服務，惟自從印尼宣佈獨立後，印尼語文頓成任何工作中的必需工具。如印尼教育部所發表關於教育新政之聲明中有：「各荷籍教師共擔任專科者（如化學，數學，自然科外國語等）須立即用印尼語」又如印尼檢察廳的訓令中的「審案及記錄口供須用印尼語文」等等，已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華僑要工作順利，則學習印尼語文，實為急不容緩的事。

印尼也有光榮的歷史：有偉大的莫佐巴夷王朝（Modjopahit）有治國天才加查馬達（Gadjah Mada）有愛國英雄地保尼國羅（Dipo Negoro）等等，有悠久的文化，更有廣大豐饒的土地。所以華校教育的目標，並不祇要人人識字，而是要人人能運用知識去應付生活問題的話，而華僑又認為印華兩民族必須在文化上合作的話，則華校必須加授印尼語文外，應充分注意印尼歷史地理及文化的研究。

椰城中華會館史略

楊詩詳

溯吾國與爪哇之交通始於唐宋，而盛於明清，計已有千百年以上之歷史。依可靠之記載當西曆一六一九年冬，有華僑蘇鴻崗已在耶城首次榮膺客鄉——甲必丹之職。據當時統計旅耶華僑約有四百餘名。由此觀之，吾僑寄居斯土，迄今確已數百年矣，然昔先民之居茲土也！舍從事農工商業藉以謀生活外，別無所企圖，故對於發展社會事業及提倡祖國文化等事極少人注意及之，無怪乎吾僑所處之地位日益危險，而在貿易上及經濟上之勢力日益衰頹也！

嘗聞長者言：三四十十年前，旅耶僑胞知識仍極幼稚，而社會亦非常腐敗一般僑生樂與土人為伍毫無民族思想，蔑視祖國之觀念甚深，對於祖國之語言文字習俗等多茫然不知，且當時省界觀念極為濃厚，閩僑，粵僑，各組三點會或秘密社團，每一黨首自成一派各派積不相容，故常開同室操戈之釁。凡為黨首者，內恃其勢力之雄厚，外藉地方污吏之暗助，常縱其爪牙橫行閩里欺凌弱小，良善同胞備受彼輩魚肉，而冤無可伸者不知凡幾！此外還信鬼神，沉溺煙賭，以及行為上毫無紀律之僑胞，又比比皆是且是時當地法律待遇各族居民本不一致而吾僑感受極不平等之待遇！如路照居住等等條例，吾華人均須一一遵守，因此吾僑受下級土官之嚴刑酷制所壓迫者不可勝數，吾僑方面雖則有騰任客卿者，——如瑪腰，甲必丹，雷珍蘭等！但彼等為權責所限，不能多所作為，安能為同僑謀幸福，當時有識之士，感覺吾僑處在此種情況之下前途非常危險，倘不謀補救之方，恐禍至之無日。於是極力鼓吹僑眾團結一致，起而組織屬於華僑全體之社團，冀藉此機關以改良風俗，宣揚孔道，提高吾僑地位，提倡民族教育。——聯絡同僑感情，並使各會員遇有困難時能互相援助，自此動機萌芽之後經過種種困難與周折幸籌備委員李興廉，丘亞樊，陳金山，丘享賓諸君之努力，復蒙吧督准予立案認為法團，會館竟於西曆一九零零年六月三日正式成立，命名為吧城中華會館，總會設於吧城，得設分會於荷印各處。成立之後首先選舉董事，同年十月三日晚為會董首次召集之期；當會議席上，由公證人勃良氏親筆在印花上繕寫證書一張，以資遵守，並將會章及其發生效力期限對眾宣讀一遍。隨即推舉十四名常務委員，規定每晚輪值蒞會所辦理會務。復由大會通過發行無息債券及舉辦月捐案，從此經費已有着落，即將預定計劃次第實現，乃於會館成立後之次年擬辦學校，設立施濟部及喪事部旋又添設英文部。自後各項工作循序漸進，成效卓著，對於社會事業尤多貢獻。因此深獲僑胞信仰及外人重視，前此具有雄厚勢力之三點會——公司，至是時亦逐漸消滅矣。而當時中國政府對於僑民亦撫慰有加，除時遣派政府人員及軍艦前來宣撫外，復在南京設立暨南學校，專收容僑童回國就學，以資造就，曩昔居留政府或地方官民對於華人入荷籍操荷語者均不甚歡迎，即吾僑子弟欲入荷校肄業者限制亦極嚴，自會館成立之後居留政府對於華僑之態度為之變，將待吾僑之苛例逐漸革除，對於吾僑之進出口極少留難，吾僑之居住旅行從此亦絕對自由，隨又在西曆一九零八年七月一日設立荷華學校，招攬一般華僑子弟肆習荷文矣，據上所述吾僑之地位當時之能增高者，不可謂非會館成立後所獲之效果也。此外，又如會館附設之學校，為荷印僑界規模最大之學校當茲時勢日益不景氣之際，每月仍開支六萬餘盾，之教育經費，此種精神魄力，後起董事諸公殊足引為自豪，而對於創辦人，亦可告無愧者也，此後發揚光大，仍賴負責諸公之努力謹引領馨香祝之，茲更將首屆董事芳名錄，附設學校臚陳如次：

(一) 第一屆董事芳名錄

總理潘景赫。副總理丘亞樊。顧問丘紹榮。書記陳金山。副書記丘享賓。正會計許南昌。副會計蔡有德。董事黃坤興。陳光秩。梁映堂。許金安。胡朝瑞。溫亞東。黃坤玉。李興廉。潘立齋。陳天生。胡先情。李金福。

(二) 學校

自一九零零年會館成立之後，董事部以為社會事業應興辦者固多。然尤當引為急務者莫若創設學校。蓋普及教育為發展他項事業之基礎，不有教育欲求各項事業之發展，猶之緣木而求魚耳。於是選舉丘亞樊，陳金山，李興廉。李金福。陳光秩，胡先情諸君為籌備委員，進行一切，慘淡經營，歷時半載，一九零一年三月十七日本校遂告成立，命名為吧城中華學堂，聘盧君桂勳為總教習，採用國語授課，以小學讀本

充作基本教材。又於同年九月一日添設英文部命名為Yale Institute 或簡稱為中華會館C部，並敦聘李登輝博士為主任兼委員，該部原係獨立性質，與中文部不相聯絡，至一九零五年一月間中英兩部始合併為一。

當本校未成立之前，荷印政府雖無嚴禁華僑子弟入荷校肄業之明文，但對於華童入荷校肄業者限制極嚴收費亦昂。因此吾僑子弟絕少受教育之機會，而斯時吾僑私人所設之蒙館蒙師皆操閩，粵方言以施教。且學童閩僑子弟佔多數，因客籍兒童年齡達五六歲時，即遣之回國故也，此外荷印學校僅有一二所，教師多由荷印土生學識淺薄者充之。英文學校也有兩三所，充當教師者皆係英屬地土生或印度人。上述三種學校統計華僑學生一百餘人，但當時吾僑子弟已達入學年齡者約有千名之多，當本校成立之始，規模雖小，但頗得同僑信仰及外人稱譽，當時瑪腰趙德和且將公館創辦之明誠書院——義校——廢除，義校學生歸併於本校，而公館撥助義校之經費，亦從此批准轉發歸本校焉。

開辦之初年，全校學生僅卅二名，規定學生每月學費最低者一盾，最高者十盾，且兼收女生，女生得與男生同一教室上課，惟不得同一桌位。是時尚無助教，一切功課由校長擔任。校長除授課外，每週尚須舉行公開講演一次，孔子學說——隨後又作擴大宣傳，並將演講詞在巫文報發表，藉借經道。至一九〇二年，學生漸增，始添聘助教二人。至一九〇三年，教員連同校長人數共有五名。至一九〇六年，教員人數增至九名。其時學生程度最高者。方達到高小一二年級。乃於一九〇七年二月間選取程度較優之學生十餘名，遣之回國，就學嶺南，是為本校遣送學生回國之始。又於一九〇九年四月間，舉行小學畢業會考，參加考試者，尚有隆華，文華，茂華，西華，丹華，新華，牙華之學生，人數約卅名，洵乎公元一九一一年，學生人數驟增，當清末時，學生僅三百餘名，至是年五月間學生統計有五百五十七名，其中免費生佔一百五十名，是時課程為修身，經學，國文，國語，算術，歷史，地理，理科，圖畫，手工，體操，唱歌，英文，純係兩等小學課程，蓋當時會館雖已設立中學部，但該部之權責不屬本校，一九一五年十月底學生人數為五百六十三名，其中女生佔一百卅九名，是年在本校前校長趙正平教員何震生劉壽鼎張群等私率北旋，參與倒袁運動，一九一八年學生人數為五百六十名，其時已有中外男女教員凡廿八人，而當年校費為四萬四千七十餘盾，迨至一九二六年七月間學生人數為五百四十三名，較之一九一一年減少十餘名，惟學生程度方面稍有進展，是時男生已達到高中一年級，女生已達到初中二年級，男女兩部中學生計有五十五名，是時本校創辦已有廿餘年在歷史過程中算是已告一大段落，且邇來成績亦甚卓著，惜彼時會館經費非常支絀，所存現款僅有九千盾，而當時喪事部會員有千多名，假令同時有廿名會員。不幸身故。會館當局須供給巨量賻金。則本校財政將受其影響而陷入絕境。故當時會員中曾有提出將本校停辦之議，幸未得大會通過。且有一部份熱心董事出而設法籌款補救。始將此難關渡過。

公元一九二七年秋，湯武傑君南來主持校務。接任後，首將高級女生部與男生部合併以節糜費，次將中英兩部酌加改善，使課程不致重複，學級不致凌亂。後又創立科學室。以促進學生之科學知識。擴充圖書館以滿足學生閱書之熱望。此外又將各項重要組織如學生自治會。訓育委員會。各科教學研究會……等次第設立。均獲得相當成效。公元一九三三年秋學生人數增至一千〇四十餘名。且歷年所舉行高中初中高小各級畢業考試。成績均極優良。

公元一九三五年七月底 湯教務長辭職返國。自此校務由學務委員會委託在教職職員劉耀曾。張國基。許慶坤，高進基四君暫行維持。旋由董事部函聘左任俠先生來長本校。左先生於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五日抵吧。接任後力謀教務之發展。將昔日校內各項工作努力繼續進行，或加以改善外。又將學校行政分為教務，訓育，事務三股以利進行，藉收分工合作之效，此外凡校內一切措施，皆求合於科學化，迄今本校已有卅六年之歷史，依吾人之觀感，此刻校內一切設施，雖不敢謂為盡善盡美，但邇來校務確已日益進步，然昔有言，創業難，守成亦不易，尚望社會人士，從此益加熱心贊助，使此僑眾最高教育機關，更加發達，此則不獨本校之幸，抑亦吾僑之福也！

一九卅七年，會館自創辦迄今，其附設之中華學校程度已至高中三年級，學級編制，係分設中小學兩部，中學係採用三三制，計高中組三級，各級分普通與商科兩班，學生共八十七名。小學部採用四二制，

小組四級，各分甲乙丙班，學生共四二五名。高小組二級，亦各分兩班，學生共二〇一名。本校因校舍不敷。暫未開辦幼稚園，故於小學組之下，另設預備班一級，分甲乙兩班，其性質相當於歐洲母道學校，

學生共八十八名。總計全校中小學學生一〇六二名，各部均係秋季始業。是時中學部教員廿二名，小學部教員十四名，校中逐月經費共五千四百餘盾，並於去歲五月間由董事部議決，改任教務長為校長，使之總攬教務，訓育，事務三方職務。

本校鑒於僑童因家境寒微失學者頗夥，而此輩兒童少年失學，將來長大知識毫無，倘不及時謀補救之辦法，非但影響個人人生計問題，於整個民族之興衰，亦有莫大之關係，因此學校當局乃於公元一九卅五年間創設義務學校（下午班）當時學生計七十餘名，開辦一年後增加一倍，學生之一切書籍文具均由校中供給，平均每月約費卅餘盾，至其來源除每月由公館津貼十盾外，餘俱由八華學生自治會負擔，任職該校之教職員均係八華高初中學生。絕不受酬，蓋全係義務性質，並由教務處指派一位教師逐日到校視察。

校董林玩璉先生，於本年五月十五日，病故于香港，本校同人聞訊之下，殊深惋惜，蓋林先生生前極端熱心教育事業，對於本校圖書館捐助尤多。

又本校創辦人潘景赫先生，亦不幸于本年七月間逝世。潘先生係會館首屆總理，及後又改任名譽總理，連任卅七年至逝世時為止。當是年七月初會館改選董事，潘先生亦曾躬親蒞會。其生平愛護本校之熱誠，於此可見也。

自七七事變以後，日本加緊侵華，因此祖國國難日趨嚴重。傷兵難民之待援手者，亦更形急切。故本校師生自本年八月初開始極力從事募捐，接濟祖國賑災之用，除隨時自由捐款外，並逐月自認月捐，雖舉行助賑之工作方式未盡相同，然欲稍盡棉薄以期增加救災之力量，則此物此志，未嘗或渝，且成績之優，夙為遐邇共聞者也。

又本年倫敦商學教員聯合會舉辦之商業技術考試，經於十月八九兩日在本校舉行。考試，及格者計卅餘人，除兩名是外人外，其餘均為本校學生，此與前此數次參加港大（始於一九廿五年）燕大入學考試（始於一九三三年）及一九卅八年應考倫敦劍橋大學海外舉行之高中畢業試驗，均獲及格者，可以先後相媲美焉。故說者多謂本校學生以英文程度優良見稱，信不謬也。

（附註：本校高中畢業生林清金君，曾華麟君，李淑媛女士於一九卅八年十二月應考倫敦劍橋大學海外舉行之高中畢業試驗於一九卅九三月底得該大學報告，三人均獲及格。）

一九卅八年，本校董事尚少更動，故每屆選舉大都得連選連任，本校第五屆總理吳謙吉君任期雖短促，但亦有三年之歷史，（一九卅五年至一九卅八年）吳君解職後，由陳富定君繼任，是為第六屆總理。陳君連任數載，直至爪哇淪陷後始於無形中解職。至于教務方面自左俠校長於本年五月間辭職返國後，即由英文部許慶坤君兼攝校長職務一直至同年七月一日始由新聘教務長曹毓琮先生接任，在是年八月間，全校學生有一千一百九十八人，計中學部四百卅八人小學部七百六十八人。

一九卅九年，本校為適應環境之需要，及促進幼稚教育起見，乃於本年四月初增設幼稚園一所。學校當局，又鑒于當地師資缺乏，影響於僑教者甚大，故又於同年十一月一日特附設速成師範科一班，藉以解決師荒焉。又創辦中華會館之中心人物，陳金山先生亦於是年二月廿四日仙逝。當會館初成立時。陳先生任書記職，及年事漸高，始不復過問八華校務。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六日，本校師生在校開會追悼前英文部教務主任許慶坤先生，自許先生主持該部主任後，學生英文即嶄然露頭角，其平素對於教學之努力，於此可見。

一九四一年，客歲，會館成立四十週年，祇因時局關係，未能舉行慶祝，而本年三月十七日又為學校成立四十週年，但是時國難方殷，國際風雲緊急，因此亦未舉行慶祝，惟當時刊有一段記載，敘述關於會館創辦人許瑪腰之文字，足以資記述者，茲特附錄於下。

「許金安瑪腰為碩果僅存之八華創辦人，當會館初成立時即任董事職，又至一九一〇年復兼膺監護職，迄太平洋戰事發生時，已有四十一年之歷史，其平生非僅對於八華勞苦功高，對於公益事業之功績，尤不勝俚指，足為前輩華僑之典型後代之模範，殊可敬也」。又是年為日本南侵暴風之前夕全校學級共分爲廿八班，下半年則縮為廿六班，學生總計人數計一千一百六十一人，其中男生佔八百十二名，女生佔三百四十九名。是時教務主任為劉耀會先生，劉先生擔任斯職，有悠久之歷史，正恰似俗語，所謂老馬識途，對於教務上一切措施，妥當貼切，絲毫不差，故戰前八華教務能蒸蒸日上者，多得力於劉先生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對英美宣戰，荷印捲入旋渦，迨星洲淪陷，爪哇即形成唇亡齒寒，陷入四面楚歌

之境，隨着日軍佔領巨港油區，自此荷印軍事節節失利，學校當局，察知大局已急劇轉變，於是加發教師贍養費數百盾，旋于次年二月底宣佈停課，絃歌之聲因而中輟，既而荷海軍在爪哇海海戰一敗塗地，從此日軍推進勢如破竹，長驅直入，即由東爪格利色，中爪印地拉馬由，西爪萬丹地區三處海口登陸，吧城於是年三月五日棄守，荷澳軍掃數退守萬隆，旋又于同月十三日宣佈無條件全面投降，於是日軍，遂于吧城設立軍政監部為最高行政機關。自此公私財產概被剝奪，其他一切行動，皆被取締矣。

當時本校校舍首先被強徵為俘虜收容所，自後學校停辦，整個民衆皆徬徨岐途在日寇刀光劍影之下圖生。

一九四二年七月底經日軍當局批准開學之華童學校十五所，本校亦獲得批准開辦，校址分為兩處，一，八帝貫中華會館民衆學校，校址照舊，但舊校址仍滿住俘虜，隨後由印尼教育部批准接收戰前檳榔社荷華學校舊址，因此改在該處復課，于八月初開學。二，孟加勿利中華會館華童民衆學校，即戰前貧民學校地址，于八月一日開學，學制係採用六學年之完全小學，並附設幼稚園，科目：為中文，日文，巫文，及小學應修各科，當時所收學生多半係原在荷校肄業而轉學者，蓋是時僑衆始既然大悟學習華文之重要也。

此時董事部早已無形解體，改由董事中之一部分人如余春祥，陸子明，高溪春，陳撫辰諸君，負維持校務之責。

一九四三年七月七日方能在八華舊校舍復課，蓋前被徵作戰俘收容所之舊校舍雖早已由日軍當局交還，惟校中書籍儀器，用具，及其他一切設備全被破壞，損失之鉅，無從估計，實非短時間所能恢復者也。是時學生人數，共計二百十名，班次則由小學一年級至六年級，同年四月間，日軍當局下令各華校重新註冊，且徵收手續費每份多至五百盾，適炮竹巷華校與市府某項條例有所抵觸，市府竟下令將該校與本校合併，祇以該處校舍狹小，學校當局乃租打邦巷張公司工廠廠址，充作校舍，繼續開課，自此本校除正校外，增設三分校焉（檳校孟校格打邦校，歲月不留，光陰易逝，一九四四年，為日寇占領爪哇第三年度矣，此時日軍，對於太平洋軍事已表現失利之象徵，且組織所謂奉公會，強迫民衆須將一草一木化為戰力，平日教師和學生除上課外常奉命前往指定地點鑿草平埔，或採薙麻及其他工作。一九四五年春，日軍在太平洋各島戰事一敗塗地，為作補充兵員計，在此間招募兵補，從事訓練，因此檳校校舍，被徵作兵補營，所有學生乃於同年四月間歸併入孟校及正校肄業。

是年秋八月十三日午後日皇頒佈投降詔書，但此間日軍當局，守口如瓶，延至八月廿二日方在報端發表，是時時局動盪，且印尼人正在爭取獨立，時聞西粟（準備）之聲，因此，本校為學子安全起見，迫而暫時停課，旋又奉董事部命令正校及二分校准於十月一日復課，（停課係由九月廿四日起）在課程上將日文取消，恢復英文一科。是年冬正校小學部學生一千一百卅六名，幼稚園共計一百四十七名，中學部尙付闕如。

一九四六年爪哇重光後，本校陷於經濟窘困，校務紊亂困難期中，不幸于二月十八日發生風潮，鬧得滿城風雨，曹校長因而消極辭職，教務改由王正寅，林偉民，周良釗，陳明風，陳若文諸君主持，結果風潮不致擴大。

且本校一向以學費為重要收入，昔年支薪不多，設備簡陋，經費強可應付，但在戰後情形太變，甚至逐月教員薪俸無法支付，當是年九月間新董事接任時，校方尙積欠債項五萬八千五百餘盾，校舍校具皆破舊不堪。迨至一九四八年已將債項還清，且添置校具，及改造修葺校舍等等，所費在荷幣五萬四千五百九十八盾九方五，日幣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九盾。乃截至一九五零年春，已有不少之存款，事在人為，信不謬也。

又本年十月底董事部將教務處改組重新委派五位教員執行下列職務：

周良釗先生主持教務。

甄照華先生主持英文部。

高進基先生主持中學部訓育。

楊詩詳先生主持小學部訓育。

彭慶松先生主持事務。

隨後由五人中公推高進基先生為主席，

一九四七年六月間，邦校校舍被業主收回，該校學生乃歸併於正校及孟校上課，又是年正月十日開學時正校班次統計如下：

高中兩班初中五班，小學廿二班，幼稚園一班，迄今太平洋戰事告終雖逾兩載，但在淪陷期間本校校舍及其他一切設備慘遭破壞，遂使校務頓呈紊亂復雜現象，甚至經費師資，教薪學費等等重大問題，無時不在艱難窘困中，幸賴學校當局學務委員會以高瞻遠矚之卓見，大刀，剷斧斬亂蕪之魄力，打破當頭難關，居然獲得妥善辦法，免得發生風潮，誠屬幸事。

一九四八年，社會秩序已漸漸安定，校中經濟亦漸有起色，學委會之新計劃均已逐漸施行，在不久之將來，當能恢復戰前壯觀云。同年六月間舉行一九四八年度畢業班考試，是為第九屆幼稚園畢業試驗，第四十二屆小學畢業試驗，第十五屆初中畢業試驗，統計人數四百餘名。

同年七月間學生人數增加尤多，於是從是時起，初小三四年級學生均改為下午班。

一九四九年秋董事部撥款萬餘盾，將校內空地鋪以土敏土，昔日天雨時泥濘滿地不便行走者今已平坦美潔，不忌風雨矣七月初學校又舉行一九五〇年度始業式是時全校教職員為一百一十人，學生人數四千餘人學級自小學至高中，分為七十班，分上下午上課。

本校自曹校長辭職後，教務事宜概由教委會主持，但董事部認為斯職不可久懸，乃於是年十月間聘謝佐禹先生為本校戰後首屆校長。

中華會館附屬中華學校，論程度已至高中三年級，且與中學程度標準得相吻合，教員更不少宿學之士，至于校職人員之多，學生人數之衆，規模之大，在印尼華校中未有能與之並駕齊驅者，飲水思源當年創辦會館之前輩華僑，其功未可埋沒，夫教育為興聖事業係屬百年大計，固非一蹴可幾者也，願吾僑衆以後更當本其扶植熱忱群力贊襄，則前途正未可限量也。

編 後 話

本文作者服務本會館學校迄今共三十八載對於本會館史料，知悉頗詳，本文初稿，原不止此惜因篇幅關係，不得不忍痛割愛，酌予刪除，謹此向作者道歉並希閱者諒之。

編者識



八華圖書館簡史與瞻望

潘新瑩

只要我們參看八華四十週年紀念刊中的第七及第一六九頁，就可以知道：創辦中華會館不久以後，就設有圖書館了，而中華學校的開辦，還是以後的事。所以才長圖書館自始就隸屬於中華會館，後來雖然有一個時期是隸屬於學校，但戰後，爲了學校方面，乏人管理，董事部又接收回去，直到現在還是由董事部直接管理。

在戰前，圖書館裏所存的書，據說數量很可觀，只可惜在日軍進佔椰城時，曾把館內的圖書燒毀一部份，所以現在剩下來的已不多，而這些餘下不多的圖書，其倖倖保存，還是賴一位被集中的英籍倫敦圖書管理員某君的整理，因當時的八華，已爲日軍改作英後集中英、荷、美、奧人士的大本營了！但當荷人被集中校內時，也許爲了感到睡硬地板的不舒適，就不惜把那位英人整理過的圖書當作褥子或摺成蓆子用，所以等到日軍投降以後，不但已混亂異常，同時更毀壞不堪了！因此到現在，雖然還有一些留餘下來的書籍，却難得有完整的一部，倘我們找書時，發現只有下冊而沒有上冊，或者一套書，只剩下不完全的幾本，那是不足驚奇的！

戰後的圖書既是那麼混亂，而大家又公認：「圖書館是學校所不可缺少的」因一方面要供師長自修以期智識的向上，另一方面也要供學生閱讀，以補充他們課本的不足，使他們從各種書籍中，知道古今英雄豪傑的功業，中外碩學大家的高論，從而啓發他們的智識，涵養他們的德性，這樣我們便都感到對這些圖書有再從新整理的必要了！於是戰後學校重開後，這工作就交給學務委員會去辦理，但或許爲了那時的圖書實在太混亂了，雖然曾數度換人管理，仍舊弄不出條緒，所以不得不另設一圖書委員會，由梁有蘭，施文連，蘇鴻發，湯祥麟，邵錦標諸先生去負責，而委任梁有蘭先生爲主席，所以目前這圖書館與學校的關係可簡寫如下：

董事部	}	圖書委員會——圖書館——館長
		學務委員會——學校——校長

至於圖書館內部的組織，只由一位館長及一位助理共同管理。館內的書籍有中，英，印，荷文四種，而中英文書比印荷文書的數量較多。我們就把這些書分成中文和洋文兩種，（這裡所指的洋文是指用臘丁字母寫成的一切書籍）然後再從這兩大種，分出好幾十類，每一本書，我們寫同樣的卡片兩張，一張夾在原書裡，以便借書時夾在借書者的借書證裏，因這麼一來，既可以免得多一種登記借書者姓名的麻煩，也可以省一些時間。至於另外的一張，我們就以作者的姓名，順英文字母的次序，排列在目錄箱的格子裏，在每一個格子外，又註明了那一類是屬於那一個字母，那麼借書者只要看看目錄箱裡的卡片，就不難知道：所要借的書，館裏有沒有？如果是有的話，也只要記好那本書所屬的英文字母及其號數，就能够從書櫥裡找出那本書來；（除非已先給別人借去了才找不到。）所以我們雖然不採用 Decimal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的方法去編排，但借書的手續却很簡便。此外當然還訂有借書規則，及各級借書時間表，以防借書時，人數太多，擁擠不堪，有不便查看書籍之苦。

目前的八華圖書館，除了報紙，雜誌，畫報等可自由閱讀的以外，統計起來，還有二萬多冊的新舊書，這規模雖然不算太大，辦事的人員也嫌太少，比起此地博物館裡的圖書館來，又不免有小巫見大巫之感，但比起其他華校或社圖裏所附設的圖書館來，我們的圖書恐怕還算是最多的，而且我們館裡的書，又有不少是難得的，如大清律例，圖書集成，Encyclopedia Sinica,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An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 ……等有價值的書，所以我們曾想擴充這圖書館的範圍不只限本校員生閱讀，進而改爲公衆圖書館，然後再收一些圖書費，以所得的款項，添買大量的新書，充實內容以刷新這有歷史性的圖書館，使大家不僅有新舊書可讀，以促進本國文化而謀大眾的進步，同時也可使此地僑胞有進德，修業及作正常娛樂的場所。如我們能設法擴充這一圖書館而發展圖書館教育，則不論對學校或對華僑社會，都可獲得許多好處，這是毫無疑問的，不過在目前，要立刻實現這個願望，事實上又有許多困難，而主要的困難是經濟，因爲現在的圖書，不論中文或洋文價值都很貴，其次是購買的不容易，有許多書是買不到的，就原有的書，一旦遺失，也很難有補買的機會，所以除了瞻望以外，只好把計劃藏在心底裡，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實現這理想，使這古老的圖書館在新教育上放出一線光彩。

一九四九年中華會館全年會務概誌

本年四月廿三日爲本會館一九四九年度全體董事滿任之期，此後會務工作將由最近召開之會員常年大會中，選出之一九五〇年新董事接任負責進行。

際此新舊董事將行交代之期，茲將本會年來會務大要簡述如下：

「學校方面」

一九四九年度下學期本校共有學子四千零四十七名，分爲七十六班，其分佈情形如下：

校址 班 上下午 別	八 帝 貫				孟 加 勿 刹				總 數	
	上 午		下 午		上 午		下 午		班 數	人 數
	班數	人數	班數	人數	班數	人數	班數	人數		
幼 稚 園	3	206							3	206
初 小 一	4	217			1	66	1	82	6	365
初 小 二	5	277			2	123	1	39	8	439
初 小 三	1	50	5	267	3	156	1	32	10	505
初 小 四			8	40	2	108			10	518
高 小 一			5	279	3	149			8	428
高 小 二			7	307					7	307
初 中 一	4	221					4	187	8	408
初 中 二	3	179					3	147	6	326
初 中 一	3	186							3	186
高 一 簡	1	58	1	41					2	99
高 一 普	1	54							1	54
高 二 簡	2	83							2	83
高 二 普	1	35							1	35
高 簡	1	28							1	28
	29	1594	26	1364	11	602	10	487	76	4047

在此四千零四十七名學生中，全免學費之學生佔七十名，爲使學生學業，教務及一切事務均能順利進行起見，本校聘用一百零二名教師，二十八名職員及二十八名校役。

關於教務方面，自一九四九年十月起，爲使本校畢業生能有投考印尼大學之程度起見，除原有功課外，本校高中普通科一、二年級一律課外加授化學，物理，生物，與荷文等科。

一九四九年本校全年財政收支結算，計收入學費六十八萬二千零五十九盾一方半，支出教職員薪金及其他費用計共六十八萬二千零三盾三方，收支相抵，盈餘五十五盾八方半，成績尚優。

鑒於目前本校學子人數日增，原有課室不敷應用，影響華僑學子學業前途至鉅，本校董事部主席陳永福先生提議發起籌建新校舍，以容納無法收容之學子，而發展華僑教育，此提案經於一九四九年間數次召開會議討論，延至本年三月十八日最後一次召開之董事會議中議決接受辦理。

籌建新校舍預算如下：

地皮	二十萬
辦事處與會客室	七萬五千
卅間教室（暫可容納一千五百名學生）	三十萬
廁所與小便間（分爲男女各兩排）	二萬五千
寄宿舍（暫備住宿五十人）	二十五萬
網球場	一萬五千
足球場	一萬
桌椅及用具	六萬五千
其他	六萬

總計一百萬盾整。

上述建校議案既經董事部議決辦理，本會即展開籌募建校基金運動，而今正在加倍努力積極進行中。

關於聘請教員以半年爲服務期限事，曾引起誤會，蓋此舉實有輕視教員身份之嫌，因此於一九四九年五月廿七日召開董教聯席會議，（出席董教計七十二人），議論結果，由董事部議決，由一九四九年七月份起廢除此項聘約，（實則此項聘約亦非董事部所訂立者），務使教員享受與普通勞工聘約相等之權利。

「鷄尾酒會」

於一九四九年間，本會董事部曾舉行鷄尾酒會二次，即於八月十二日下午曾舉行董教職員聯歡大會，藉以促進及聯絡各方感情，參與者計一百〇三人，復於同年十月十三日晚舉行歡迎及介紹新任校長（謝佐禹君）鷄尾酒會，（按謝君於一九四九年十月八日由香港抵達），參加者共一百〇一人。

「其他」

自一九四九年八月起，（循稅務局之請求）本會不向教職員，校役代收遞渡稅及僱傭稅應繳稅款。

一九四九年八月本會董事陳恩旋先生自行負責將桌椅寄放本會，計椅子一百四十八張及桌子三十張寄存於八帝貫正校，另椅子六十張寄存於孟加勿殺分校。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根據同年八月三十日董事部會議之決議），本會重行加入本城中華總會爲會員。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五日爲促進本會學校學務起見，本會特向政府呈文申請撥發教育津貼金。

「注射防疫針」

一九四九年正月及二月間椰嘉達市衛生部（D. V. G）曾向本校二千六百四十四名及一千七百零三名學子施行注射預防霍亂，腸炎針及種牛痘，復於同年十一月間紅十字會施行注射預防霍亂，腸炎及痢疾針受注射者共三千三百六十五名學生。

「贈品」

於一九四九年四月本會接到捐贈物品如下：

陳永福先生贈 ZIMMER MANN 牌鋼琴一架（連其三年之擔保書一份）。

陳恩旋先生贈 電風扇一架及木製凸字體之中華會館招牌一幅。

「喪事部」

一九四九年本會喪事部工作表現略有進步，惜限於人力與財力，致各種發展如設備喪事車等計劃，一時未能實現，不得不留待下期再爲進行。

